

近代歐洲的「中國形象」及其烏托邦價值

武斌

十七世紀以後，中國與歐洲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文化交流高潮。來華傳教士們通過書信、報告、著作、回憶錄以及翻譯中國典籍，把一幅關於中國的「肖像」展示在歐洲人面前，大大增加了歐洲人關於中國和東方的知識，開闊了歐洲人的世界圖景，啟蒙思想家們對中國文化表現出濃厚的興趣。中國文化對啟蒙思想家的激勵和影響，啟蒙的文化景觀。在啟蒙時代，中國成了歐洲人嚮往和追求的「理想王國」的一個典範。這種典範或「烏托邦」發揮了巨大的參照系功能，對他們的社會改造方案起了示範作用。中國的典範或「烏托邦」在啟蒙時代激勵了歐洲人對「理想王國」的嚮往和追求。

可以說，直到十七世紀，歐洲和中國才有了真正意義上的接觸。在此之前，歐洲人只有對一個遙遠帝國的模糊印象，以及某些旅行家（如馬

可·波羅等人）對於中國的不完整的和相當個人化的記述。一六〇一年一月，利瑪竇來到北京，這是第一個進入中國政治文化中心的歐洲傳教士。

從此以後，一直持續了一百多年的時間，先後有數百名傳教士踏上了中國的土地，他們大多數都在中國生活了相當長的時間，與中國知識分子和民

眾有著廣泛的接觸，其中有些人還登

經產生了持續的影響。

傳教士展示的「中國形象」

堂入室，進入中國的政治中樞。而在歐洲，自從進入所謂「黑暗時代」，傳教士是唯一一種知識分子的存在形態。雖然啟蒙運動前後，新型的知識分子開始出現和逐漸成爲文化傳承的主體，但此時的傳教士們仍然擔當著文化傳承的使命，他們之中相當多的人都是當時的飽學之士。那麼，當這些博學的並且有著相當文化興趣的知識分子來到古老中國的大地，直接接觸巍峨輝煌的而對他們來說又是完全陌生的中國文化，可以想見，在他們的心靈會產生何樣的衝擊和震撼；可以想見，他們會以何等的興趣和何等的熱情把中國文化介紹給他們的同胞。於是，在十七世紀以後，中國與歐洲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文化交流的高潮，在歐洲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對於中國的熱情，「中國」以及中國的器物、中國的藝術、中國的思想，成爲歐洲上流社會的時尚。甚至，「中國」成爲許多歐洲思想家的一個烏托邦理想。在以後的歲月裏，這種「中國熱」對於歐洲社會文化的變遷，曾

傳教士們踏上中國的土地，本是爲傳教而來。但是他們發現，在中國傳教並非容易。因爲中國悠久的傳統思想在中國民眾中根深蒂固，具有巨大的權威性，要拿另外一套東西取而代之談何容易。於是，他們採取了一種所謂「合儒」的策略，就是利用中國文化典籍特別是儒家經典來論證基督教教義。在他們看來，贏得中國人同情和興趣的有效方法，就是使基督教義附會儒家的思想進行講授。爲了實現這一策略，他們不僅在服飾、志趣、生活方式等方面模仿中國士大夫，而且對中國文化和典籍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可以說，他們的這一策略是成功的。正是他們的努力，使基督教敞開了古老中國的大門。但是，他們的做法卻受到了羅馬教廷和歐洲宗教界人士的強烈批評，他們在歐洲的上級也要求對此作出說明。來華傳教士們爲了給自己的做法辯護，同時也是爲在華傳教爭取更多的資助，吸引

更多的傳教士來華傳教，他們寫了大量的報告、書信、著作，向歐洲介紹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宣傳他們在中國傳教經歷和業績。法國學者伊莎白爾·拉瑟拉指出：「傳教士們爲了向上級陳述自己不同尋常的做法，不得不對自己周圍的形勢發表感想，因而在歐洲出版了自己的著作，這爲歐洲學者最初客觀地描繪『中國』，提供了一個基礎。在啟蒙哲學家們進行政治及道德沉思時，這些著作就成爲他們的參照物，它們組成了當時的中國的首像。而且這一情況維持很久，直到十八世紀末。」（註一）

根據在華傳教士提供的大量書信、筆記、報告、著作等資料，十八世紀時，法國的耶穌會士編輯出版了三部篇幅巨大的叢書，號稱十八世紀歐洲關於中國的「三大名著」。這三部叢書是：

《耶穌會士書簡集》

由法國傳教士盧哥比安（Charles Le Gobien）、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和帕都葉（Louis Paroutlet）先後分類編纂，歷經七十多年，於一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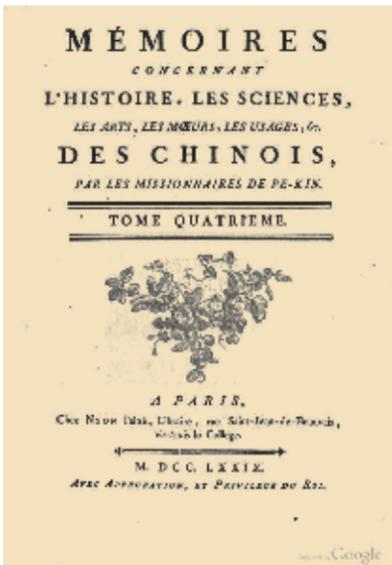


即「中國學」(Sinology)。傳教士們提供的文獻為中國學的建立奠定了基礎，同時，他們還通過與歐洲學術界的廣泛聯繫，直接影響了一批學者對於中國的研究熱情。不僅如此，他們的中國觀念、研究偏好、關心重點以及開關的研究領域，亦即他們研究中

遙遠而神秘的國土的模糊印象，而是建立起比較完整的知識體系，並發展成爲一個獨立的學科領域。所以，在「十七及十八世紀中，耶穌會士是溝通歐洲與遠東文化的橋樑」。(註二)關於傳教士們的這一貢獻，德國哲學家亞斯貝斯指出：「耶穌會傳教士以他們的方式完成了偉大的業績，他們在中國第一次在源頭上探求了這一宗教現實，研習了那裏的宗教典籍。通過內容豐富的描述，他們將中國的信心和思想的知識介紹給了西方。」(註三)

歐洲「中國形象」的解釋學特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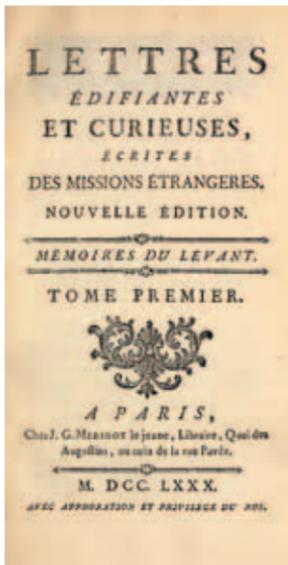
傳教士們關於中國的文獻，在歐洲知識界引起巨大的反響。自此，在歐洲開始了對中國的專門化研究，亦



《中國回憶錄》



《中華帝國全志》



《耶穌會士書簡集》

○二至一七七六年陸續在巴黎出版。《書簡集》共三十四卷，其中十六至二十六卷是關於中國的。它們以通信的形式，將傳教士們觀察所得的中國政治制度、風俗習慣、歷史地理、哲學思想、工商情況等詳加報告，因而成爲十八世紀及至以後許多歐洲學者研究中國的主要資料來源。

《中華帝國全志》

全稱《中華帝國及中國領韃靼之地理的、歷史的、編年的、政治的及自然的記述》，共四卷，是法國耶穌會士杜赫德在主編《耶穌會士書簡集》的基礎上，根據海外傳教士的報告、書信、著述和筆記中的有關材料整理積纂、編寫而成的一部綜合性著作，一七三五年在巴黎出版。全部著作得自二十多位傳教士的研究成果，可以說是百五十年間歐洲人瞭解中國的一個總結，被譽爲「西洋中國學之金字塔」、「真正可以誇耀於世的紀念碑」。

《中國回憶錄》

全稱《北京傳教士關於中國歷史、科學、藝術、風俗、習慣等的紀念碑》。除了對中國專門化的研究外，當時還有許多思想家，特別是在啓蒙運動中很活躍的思想家，都對中國文化表現出濃厚的興趣，也進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但是，他們所看到的「中國」，已經不同於傳教士們文化視野中的宗教王國，而是對啓蒙運動的文化支援和激勵力量。中國文化對啓蒙思想家的激勵和影響，啓蒙思想家對中國文化的「解讀」和評論，構成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蔚爲壯觀而又意蘊無盡的文化景觀。

然而，當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進入到啓蒙思想家們的視界後，進入到歐洲文化的「意義關聯域」，便有了被重新解釋的可能性。歐洲思想家們「接受」中國文化，就是他們「理解」和「解釋」中國文化的活動。作爲「理解」和「解釋」的主

回憶錄》，先後由法國耶穌會士布萊提葉(Gabriel Breier)、法國王家學院匈奴突厥史專家德經(Joseph de Guignes)和著名東方學家薩西(Antoine Isaac Sylvestre de Sacy)先後主編，共十六卷，一七七六至一八一四年在巴黎陸續出版，是十八世紀歐洲關於中國研究的大論叢。有西方學者評論說，這部巨著的出版標誌著幾個世紀前順利地由利瑪竇開創的一種事業的完成，標誌著耶穌會士的中國學研究達到了「頂峰」。

上述「三大名著」的出版，在法國乃至歐洲引起轟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許多啓蒙思想家，如伏爾泰、霍爾巴赫、魁奈等人對中國的瞭解和研究，都從中獲得很大的收益。

傳教士們通過他們的書信、報告、著作、回憶錄，還有他們翻譯的中國典籍，把一幅關於中國的「肖像」展示在歐洲人面前，大大增加了歐洲人關於中國和整個東方的知識，開闊了歐洲人的世界圖景。自此以後，歐洲人對於中國的瞭解，不再

是通過種種不可靠傳聞而獲得的一個體，他們在接觸中國文化的時候，已經帶有一定的進行「理解」和「解釋」的認知因素或「前理解」結構。他們正是從這樣的「前理解」、從歐洲文化提供的「視界」去「理解」、「解釋」和「選擇」中國文化和中國思想的。中國思想，特別是儒家思想的一些原理、原則，被歐洲文化的框架重新「理解」和「解釋」，被歐洲文化的某些觀念進行了「替換」。這樣，啓蒙思想家所說的「中國儒家文化」，就不是儒家文化的「本文」，而是他們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一定的發展水平上對這種「本文」的一種解釋，是他們所「說」的、所「理解」和「解釋」的「中國儒家文化」。在這種解釋活動中，包含了作爲解釋活動主體的啓蒙思想家們的意識參與和再創造。這種解釋是否符合「本文」的「本意」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種解釋對推動歐洲文化的更新和重建是否「有意義」，是否對推動啓蒙運動「有意義」。

啓蒙思想家們解釋和借用中國文化和中國思想，具有較爲明確的用以



杜赫德《中華帝國全志》中的孔子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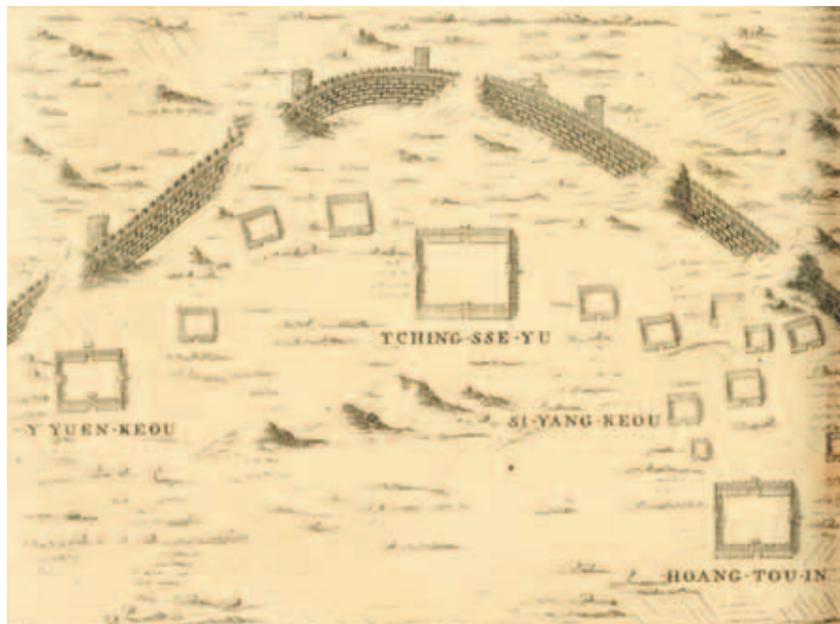
化價值。
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曾經指出：「一個文化因素，在它的本土的社會內本來是無害或是有利的，但是在它所闖進的另一個社會體中，卻很容易發生意外的、極大的破壞作用。」（註七）之所以會發生這種情況，文化傳播過程的解釋性特徵是重要的原因之

一。中國文化和中國儒家思想在近代歐洲的傳播及其發揮的作用和影響，為湯因比的這個論斷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證。
「中國形象」的烏托邦價值
在近代歐洲學者，特別是那些本身非常革命的啟蒙思想家那裏，遙遠的中國成爲他們的一個理想典範。

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說到：「在十八世紀時，歐洲對於中國文明雖然瞭解得很不全，但卻常常把它當作典範。」（註八）
在當時的傳教士的報導中，在學者的敘述中，中國常常被描繪成爲這樣一個國家，在這個國家裏，一片繁榮富庶，安定和平，人民安居樂業，講究道德，彬彬有禮，充滿智慧、文明和諧的氣氛。他們特別讚揚中國的政治制度，認爲它是穩定與經久不衰的保證。「耶穌會教士眼中的中國，是一個學問的共和國，在那裏，教育是秩序與安定的基礎，也是維持它們的手段。這個國家由於年代久遠而不知其源，人民由於政府而受惠，國家的基礎是民族精神而不是宗教，維持國家的是一個學者帝國以及一個開明的、總是很節制的、『真正的』貴族階層。」（註九）美國學者德克·卜德在列舉中國文化對於歐洲啟蒙運動中新思想的種種刺激因素時說：「特別是中國被羨慕地看作這樣一個國家，它的政府不像歐洲那樣掌握在封建貴族手裏，而是由一些高

推進西方文化的目的性。歷史賦予他們的文化使命，是批判以基督教神學世界觀爲核心的封建傳統文化，建立體現現代精神和現代意識的新文化。因而，他們從實際的需要出發，對中國文化的思想材料有選擇地加以利

用，並將中國文化理想化和理性化，作爲他們批判基督教神學思想和封建專制主義、論證新文化理想的根據和證明。他們自覺地將中國文化與歐洲文化進行比較，以中國文化的思想材料作爲他們反省歐洲傳統的參照物。中國歷史學家方豪指出：「介紹中國思想至歐洲者，原爲耶穌會士，本在說明彼等發現一最易接受『福音』之園地，以鼓勵教士前來中國，並勸導教徒多爲中國教會捐款。不意儒家經書中原理，竟爲歐洲哲學家取爲反對教會之材料。而若輩所介紹之中國康熙年間之安定局面，使同時期歐洲動盪之政局，相形之下，大爲遜色；歐洲人竟以爲中國人乃一純粹有德性之民族，中國成爲若輩理想國家，孔子成爲歐洲思想界之偶像。」（註四）英國學者利奇溫也把孔子稱爲「十八世紀啟蒙時代的保護神」。他說：「在歐洲人的心理上漸漸地形成了一種多少被普遍承認的概念，而且繼續被人信守作爲一種模範。正如『寬容的』亞洲人之爲人們口頭禪一樣，人們對中國人，單純地視爲有道德的人類。



杜赫德《中華帝國全志》中所描繪的長城

他們認爲，從中國他們發現了一個全新的道德世界。」（註五）
啟蒙思想家們在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意義關聯域」中，從自己的需要和認知結構出發來「接受」、「理解」、「解釋」中國文化和中國思想，實際上是對中國文化的一種「誤讀」。然而也正是因爲這樣的「誤讀」，才使它在歐洲近代文化發展的進程中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馬克思在一八六一年七月二十二日給斐·拉薩爾的一封信中曾提到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命題，即文化傳遞和繼承中的「被曲解」問題。馬克思說，文化遺產的繼承，「被曲解的形式正好是普遍的形式，並且在社會的一定發展階段上是適合於普遍應用的形式。」（註六）啟蒙思想家們對中國儒家思想的「誤讀」或「曲解」，把中國封建主義的意識形態「誤讀」爲反封建的思想力量，給它披上了理性和理想的外衣，從而對它進行了極有價值的文化利用。他們的「誤讀」不僅爲歐洲的啟蒙運動提供了一種文化支援，而且也給中國儒家思想文化賦予了新的文



杜赫德《中華帝國全志》中的滿漢武將

度教養的官員來管理，這些人能取得他們的官位，僅僅在通過了一系列國家舉行的考試，以證明了他們的價值之後。」（註十）在傳教士和啟蒙思想家的著作中，中國的最高統治者皇帝也受到高度的讚揚，特別是康熙皇帝被說成是一位睿智、大度和開明的偉大君主。

總之，在當時關於中國的文獻中，中國幾乎成爲一個「天堂般的地方」，與破敗凋零、危機四伏的歐洲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對於當時的歐洲人來說，中國就是一個他們所嚮往的理想之鄉，一個「烏托邦」。法國學者伊莎白爾·拉瑟拉指出，耶穌會士

一切描述，都是歐洲人製造出來的，其中包含了他們大量想像的成分。他們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社會理想加諸到一個想像的「中國」上，然後對它加以推崇和仰慕，實際上亦即是對自己的政治和社會理想的推崇和仰慕。然而，他們所設想的這個烏托邦也並不是和中國以及中國文化毫無聯繫。從中國傳來的文化資訊，介紹中國社會政治制度的文獻資料，譯介到歐洲的中國典籍，都是他們思考和探索社會改造方案的思想材料，都是他們想像和設計理想社會的範型和摹本。因而，他們創設的這個烏托邦是在中國文化資訊的刺激下出現的，中國文化是激發他們想像和智慧源泉。

無論如何，在啟蒙時代，中國成爲歐洲人嚮往和追求的「理想王國」的一個典範。這種典範或烏托邦首先發揮了巨大的參照系功能，許多啟蒙思想家都拿有關中國的材料來比照批判歐洲社會。另一方面，中國的這個典範或烏托邦還對啟蒙思想家的社會改造方案起到示範作用。比如伏爾泰和魁奈都大力讚揚中國的「開明君

們眼中的中國，「是西方所製造的最有影響的烏托邦」。由於他們關於中國的著作「提供了真正的資訊，就爲那個正在開始形成的形象增添了光彩。那是一個公民國家的形象，它穩定、世俗化、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上。這些論著既揭示了西方思想的發展，又幫助造成了這個發展，它們被用來製造一個關於中國的烏托邦。那些對自己的時代提出懷疑並在尋找一個可資參考的觀點的人，就可用來進行自己的描繪。這些論著宣佈：『另一種形式的社會是可以存在的，它極度文明，存在於世界的另一面。』」（註十二）當代法國著名哲學家福柯也曾說到中國作爲歐洲人眼中的「烏托邦」所具有的價值意義，他寫道：「對於西方人來說，一個界限分明的地區，僅僅其名字，便可構成一個烏托邦的巨大庫藏。……按照我們的想法，中國的文化是最爲講究、最爲等級森嚴、最不受過去影響的。」（註十三）

西方文化具有創設「烏托邦」的傳統。從柏拉圖的「理想國」到培根的「新大西島」，莫爾的「烏有之土」制度，主張以中國爲榜樣，在法國實行這樣的開明君主制。中國的重農主義政策、單一農業稅制、教育和科舉制度、設置諫官、興修水利、德治主義等等，都受到啟蒙思想家的推崇，並希望從中國的政治文化中汲取實際的經驗和智慧。

中國的典範或烏托邦在啟蒙時代激勵了人們對「理想王國」的嚮往和追求，激勵人們爲爭取「理想王國」的實現而奮鬥。因爲製造了這麼一個關於中國的烏托邦，就是宣稱在遙遠的地方已經存在這樣一個新的世界，因而就意味著建立新的世界並不是不可能的，就意味着著啟蒙思想家所設想的理想王國具有現實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就意味着他們爲之奮鬥的事業是可能成功的。

在啟蒙思想家們批判舊制度、舊文化，追求新社會、新文化的偉大鬥爭中，從遙遠東方傳來的中國文化，是他們擁有的一個巨大的烏托邦庫藏，成爲激發、刺激歐洲文明走向進步的一個精神動力。

作者爲瀋陽故宮博物院院長

邦」，康帕內拉的「太陽城」，以及十九世紀三大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提出的理想社會模型，這種傳統一直延綿不斷。人們一直在嘗試描繪一種超越於現實生活的、盡善盡美的社會畫面。這種烏托邦理想一方面反映了人類理智活動的超越性特徵和對理想社會的不倦追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對現實社會的不滿與批評意識。因此，烏托邦既是對現實社會的一種批判性觀照，又是對社會改造前景的一種主觀設計。不論這樣的烏托邦理想設計得是否粗樸或精緻，是否具有現實的合理性，都是人類進步精神的一種表徵，而且在實際上也成爲推動人類進步的一種精神動力。在啟蒙時代，啟蒙思想家致力於追求建立「理性和永恆正義的王國」，而他們在關於中國的各種資訊中，就發現了這樣的理想王國。中國成了他們的政治理想和社會理想的載體，成爲他們的「希望之鄉」。不過，中國人自己並沒有生活在這樣的「希望之鄉」裏，也不知道自己的國家被遠方的人們描繪的如此盡善盡美。實際上，關於中國烏托邦

註釋

1. 伊莎白爾·拉瑟拉，〈歐洲人眼中的儒學教育〉，引自許美德、巴斯蒂等：《中外比較教育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年，頁二八。
2. 利奇溫，〈十八世紀中國與歐洲文化的接觸〉，商務印書館，一九六二年，頁一九。
3. 雅斯貝斯，〈非基督教宗教與西方〉，《哲學譯叢》一九九二年第二期，頁三五。
4. 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出版社，一九八七年，頁一〇五八。
5. 利奇溫，〈十八世紀中國與歐洲文化的接觸〉，商務印書館，一九六二年，頁七九。
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〇卷，頁六〇八。
7. 湯因比，〈歷史研究〉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頁二六九。
8.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科學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頁一。
9. 伊莎白爾·拉瑟拉，〈歐洲人眼中的儒學教育〉，同註一，頁四三。
10. 德克·卜德，〈西方的中國觀念〉，引自忻劍飛：《世界的中國觀》，學林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頁一三七。
11. 伊莎白爾·拉瑟拉，〈歐洲人眼中的儒學教育〉，同註一，頁四二—四三。
12. 福柯，〈詞與物〉，同註一，頁四一。